



聖彼得堡大學與俄國漢學（1855-1919）

St. Petersburg University and Russian Sinology (1855-1919)

閻國棟 (Yan Guodong)

南開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

一、前言

19世紀中期，俄國社會經歷了一系列激烈的變革，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得到確立和發展。俄國開始積極地搶佔國外市場，掠奪原材料。但是，俄國在克裏木戰爭中的失敗使它在與西方的較量中處於劣勢。於是，從19世紀40、50年代開始，沙俄利用鴉片戰爭後中國淪為半殖民地的形勢，踐踏中俄《尼布楚條約》，侵入黑龍江流域，先後誘迫清政府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奪取我大片領土，獲得在中國境內通商、傳教等方面的特權。隨著東方在俄國對外關係天平上的分量越來越重，加強對東方的研究日顯重要，從前小規模分散的東方學教學已經不能適應沙俄擴張政策對實用型人才的需求，同時也不利於科學院和外交部對其教學情況進行直接的監督，因此，集中建立一個東方語言人才培養基地的計畫在俄國逐漸形成。經過較長一段時間的醞釀，終於在1855年8月27日建立聖彼得堡大學東方語言系。在以後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裏，這裏一直是俄國東方學研究中心和東方語言人才培養基地。俄國漢學研究的主要據點也從俄國東正教駐北京傳教士團轉移到聖彼得堡。

二、聖彼得堡大學東方語言系及漢學專業之沿革

在聖彼得堡大學東方語言系建立之前，俄國曾有幾所院校設有東方學專業。首先應該提到的是著名的喀山大學。該大學東方系建於1807年，開始有阿拉伯波斯、突厥韃靼和蒙古語三個教研室。1837年，在喀山大學校長、著名數學家洛巴切夫斯基（Н. И. Лобачевский, 1792-1856）的倡導下，在俄國高校首次成立了漢語教研室，原俄國東正教駐北京傳教士團成員西維洛夫（Д. П. Сивиллов, 1798-1871）成為第一任教授和主任。1844年又成立滿語教研室，由沃伊采霍夫斯基（О. П. Войцеховский, 1793-1850）首任滿語教授。1851年，俄國漢學宗師瓦西裏耶夫（В. П. Васильев, 1818-1890）從駐北京傳教士團回國，擔任漢滿語編外教授。到1855年合併到聖彼得堡大學之前，漢語教研室共計存在18年，滿語教研室存在11年。儘管時間不是很長，學生畢業後就職也比較困難，「但其經驗證明在大學教學漢、滿語是可行和必要的，特別是對於糾正駐北京傳教士團及非高等院校培養漢、滿語人才缺乏高等教育的狀況尤其必要。」¹ 喀山大學東方系的師資成為改組後的聖彼得堡大學東方語言系的主要班底。被聖彼得堡大學合併的另兩所學校是奧德薩黎塞留高等法政學校和哈爾科夫大學東方語言教研室，但那裏都沒有漢滿語專業。

早在1850年，喀山督學莫洛斯特沃夫（В. П. Молоствов）就開始為喀山大學東方系學生艱難的就業狀況感到擔憂。1851年，國民教育部部長希林斯基—希赫馬

1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編，《俄蘇中國學手冊》（上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頁105。



多夫（П.А.Ширинский-Шихматов, 1790 或 1796-1853 或 1855）在視察喀山時又目睹了這一事實。他打報告要求妥善安置這些學生，認為這是報考該專業學生人數驟減的主要原因。他建議將漢滿語專業的畢業生派到東正教駐北京傳教士團實習，然後將他們安置到內務部、財政部和國有資產部工作。與此同時，他還建議合併所有的東方學教學機構（俄國外交部培訓處、聖彼得堡大學、喀山大學以及奧德薩黎塞留高等法政學校），在聖彼得堡建立統一的亞洲學院。希林斯基-希赫馬多夫提出要在未來的亞洲學院講授漢語和滿語、中國民族歷史、地理、宗教、法律和文學史等課程。為了實現這一方案，俄國政府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成員來自喀山大學、聖彼得堡大學和外交部等機構。但是，這個委員會制訂出來的方案最後遭到俄國外交部的反對。原因是外交部堅持要保留其屬下的培訓處，稱這「純粹是為了滿足外交部特殊的職業需求。」² 兩年之後，俄國外交部徹底拒絕國民教育部合併外交部培訓處的要求，同時拒絕將政府專項撥款全部劃撥給未來將要成立的亞洲學院，而只同意負擔 10 名學生的培養費用。由於外交部的反對，有關方面不得不尋找其他方案。這樣，另一個方案隨之產生，即將聖彼得堡大學歷史語言學系的東方語言專業改組成東方系（又稱東方語言系）。1854 年 2 月，國民教育部部長諾羅夫（А. С. Норов, 1795-1869）向沙皇上書，強調學習東方語言的現實意義，陳述了由於外交部的拒絕而使新東方學基地組建工作遇到的困難。此時此刻，俄國侵華主力幹將、西伯利亞總督穆拉維約夫（Н. Н. Муравьев, 1809-1881）則建議在伊爾庫茨克中學講授漢語和滿語，培養翻譯人才，以爲他侵略黑龍江流域服務。4 月，在諾羅夫的主持下，又成立一個委員會，審議了所有方案。瓦西裏耶夫也上書陳述將東方語言教學集中於聖彼得堡的必要性，提議講授梵文和藏語。1854 年 10 月 22 日，俄國樞密院終於下達了由尼古拉一世（Николай I, 1796-1855）簽署的命令，決定合併當時俄國所有院校的東方學專業，在聖彼得堡大學組建東方語言系。

1855 年 8 月 27 日，聖彼得堡大學舉行隆重的東方

語言系建系大會，著名蒙古學家波波夫（А.В.Попов, 1808-1865）在會上發言。東方語言系第一任系主任卡澤姆別克（К.А.Казем-Бек, 1802-1870）宣布了 1855-1856 學年度的課程設置。9 月 1 日，東方語言系正式開學，自此揭開俄國東方學教學新的一頁。

新成立的聖彼得堡大學東方語言系包括 9 個教研室：阿拉伯語教研室、波斯語教研室、突厥·韃靼語教研室、蒙古·卡爾梅克語教研室、漢語教研室、猶太語教研室、亞美尼亞語教研室、格魯吉亞語教研室和滿語教研室等。建立了 5 個專業：阿拉伯·波斯·土耳其·韃靼語專業、蒙古·卡爾梅克·韃靼語專業、漢滿語專業、猶太·阿拉伯語專業和亞美尼亞·格魯吉亞·韃靼語專業。瓦西裏耶夫成爲聖彼得堡大學的第一任漢語教研室主任，波波夫成爲蒙古語教研室主任。

東方語言系成立伊始，專業課主要爲語言和歷史。瓦西裏耶夫爲漢滿語專業學生講授漢語、滿語和滿洲歷史，而波波夫則講授蒙古語和自成吉思汗以來的蒙古歷史。此外，所有專業的學生都要同其他系的學生一道學習一些必修的課程：神學（一年級）、俄語（一、二年級）、俄羅斯歷史（一、二年級）、俄國法律史（一年級）和法語。卡澤姆別克堅持培養實用型人才的辦學宗旨。他說：「我們系的目的絕對是實用的，那就是爲外交、軍事及其他部門培養年輕人才，爲居住在我國境內的異族服務……只有在培養亞洲語言教師時才有必要從事科研。」³ 卡澤姆別克的實用型辦學宗旨遭到教師們的強烈反對，以致於他不得不於 1858 年辭職。1859 年，阿拉伯學家穆赫林斯基（А.О.Мухлинский, 1808-1877）任系主任，開始強化科研工作，特別是在編寫急需教材方面取得一些成就。

聖彼得堡大學東方語言系經歷了不斷的改革和變化。1863 年，東方語言系奉命改組，將漢語教研室和滿語教研室合併爲漢滿語教研室，確定了漢滿語教研室講授的課程：漢語及訓詁、中國文學史、滿語及滿洲文學史。中國歷史課程被取消，而由東方歷史教研室的格裏高裏耶夫（В.В.Григорьев, 1816-1881）教授開設的「東北亞或中亞歷史」課程代替（直到 1879 年，瓦西裏耶

2 轉引自 Скачков П.Е.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ниговедения. М.: Наука, 1977, 頁 202。

3 轉引自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с середины 19 века до 1917 года. М.: Изд. фирма "Вост. лит." РАН, 1997, 頁 9。



夫教授才恢復中國歷史課程)。1864年，東方語言系再次進行機構調整，漢滿語專業和蒙古·卡爾梅克語專業合併為一個專業，名為漢滿蒙語專業。由於學生畢業後就業狀況不太理想，又一次引發關於辦學宗旨的爭論。穆赫林斯基在這一年的又簽發一個新的辦學意見，將科研目的置於首位，而把培養實用型人才視為其任務之一。1870年，東方語言系開始講授日語，並將其併入漢滿蒙語專業（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898年成立單獨的日語教研室為止）。從1878年起，瓦西裏耶夫教授擔任東方語言系主任。他極力主張增加東方語言系專業數量，於1882年提出增開藏語、朝鮮語等新語種教學。

1884年，聖彼得堡大學頒布新的大學章程，其中強調將科研目的置於實用目的之上，這也是政府對於俄國東方學的態度。是年，東方語言系根據學校總章程制訂出《東方語言系教學大綱及考試要求》（Программы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 и экзаменационные требования, выработанные ФВЯ после введения Устава 1884 г.）。這個要求反映兩個重要情況：第一，東方語言系將發展和鞏固科研活動視為主要任務；第二，19世紀末這裏聚集了一大批優秀的東方學專家，他們在國際東方學界取得了舉足輕重的地位。事實上，將科研作為主要工作不但沒有影響到教學，而且還促進了高素質實踐人才的培養。1884年制訂的教學計畫在聖彼得堡大學東方語言系發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它最終形成了科研與培養實踐人才相結合的辦學思想。印度學家米納耶夫（И.П.Минаев, 1840-1890）教授1884年曾在一次會議上對這一思想進行了闡釋：「在我們俄羅斯，對東方的研究從來都不是、也不能是抽象的。我們離東方的距離太近了，因此絕對不可抽象地研究東方。俄羅斯的利益始終與東方密切相關，我們的東方學因而也不能不體現出實用特徵。總之，對於俄羅斯學者而言，無論是古代，還是現在的東方，都不該成為科學探索靜止而絕對書面的物件。」⁴

20世紀初，聖彼得堡大學東方語言系取得進一步發展。1908年，漢滿蒙語專業分化成兩個專業：漢滿語專業及日漢語專業。1913年，為適應形勢需要，東方語言系制訂了新的教學計畫和考試規則，取代了1884年的舊規則。新計畫的主要特點是細化了教師的

專業分工，又一次調整了專業設置。這時的東方語言系一共有7個專業：阿拉伯·波斯·突厥·韃靼語專業、漢滿語專業、蒙·滿·韃靼語專業、日漢專業、猶太·阿拉伯·敘利亞專業、亞美尼亞·格魯吉亞語專業、梵文專業。從這個專業設置我們可以看出當時聖彼得堡大學東方語系的規模以及漢、滿、蒙等中國各民族語言在教學中所佔地位。到1919年東方語言系與歷史·語言系合併為止，一直是依據1913年的計畫來從事教學及科研活動的。

三、瓦西裏耶夫在聖彼得堡大學

瓦西裏耶夫從1855年喀山大學東方系合併到聖彼得堡大學時起就開始在該處任教，以後一直沒有離開，1893年退休後仍然不收報酬地為學生授課，直到1900年去世，前後40餘年。可以說，瓦西裏耶夫把自己的一生都獻給聖彼得堡大學的漢、滿、蒙古學教學事業。他從一開始就擔任教授，是漢滿語教研室的主任，1878-1893年間擔任東方語言系主任。在開始的12個年頭，瓦西裏耶夫是聖彼得堡大學東方語言系唯一的漢滿語教師，負責全部4個年級的語言教學。此外，他還講授中國以及滿洲地區歷史、地理和文學課程。瓦西裏耶夫不僅為俄國漢學的發展做出巨大貢獻，更是聖彼得堡大學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漢滿語教學的中流砥柱。他白手起家，編寫了一批教材，培養一批又一批的漢滿語翻譯和中國問題研究人才，為俄國漢學的發展，更為19世紀中俄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貢獻。蘇聯科學院院士、著名漢學家阿列克謝耶夫（В. М. Алексеев, 1881-1951）曾說，19世紀下半期俄國漢學百分之八十的成就是由瓦西裏耶夫一個人創造的。他所創立的聖彼得堡漢學派，某些學術傳統一直保持至今。

瓦西裏耶夫擔任漢語教研室主任後，為提高學生專業水平做了許多工作。他在教學中堅持循序漸進的原則，充分考慮漢語、滿語的繁難之處以及口語特點。隨著學生語言技能的提高以及升入高年級，瓦西裏耶夫向他們提供用以閱讀的文本越來越複雜，形式越來越多樣，其中包括外交函件、清朝律法、文學作品和漢文報

4 轉引自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с середины 19 века до 1917 года. М.: Изд. фирма "Вост. лит." РАН, 1997, 頁 15。



紙等。爲了能夠給學生傳授最大的知識量，他不斷完善所授課程的講義。1864年漢滿語專業和蒙古·卡爾梅克語專業合併爲漢滿蒙語專業後，學生必須主修兩門東方語言，輔修一門。瓦西裏耶夫非常重視學生的語言學習，特別關注他們的漢語學習情況。他認爲漢語不僅是中國語言的基礎，同時也是朝鮮語、越南語和日本語的基礎。考慮到滿語和蒙古語是兩國外交往來使用的語言，他積極建議學生們在掌握漢語的同時，學習好這兩種語言。1917年以前，聖彼得堡大學一直執行瓦西裏耶夫制訂的漢語教學大綱。這個大綱起初比較簡單，後來逐步得到充實和完善。1870-1871年度的教學大綱顯示，瓦西裏耶夫教授爲一年級學生講授象形文字分析（內容包括象形文字的起源、漢字形旁和聲旁的意義）、各詞類之詞源分析、句法特點。學生練習翻譯他編寫的文選中的文章。2-4年級的學生練習翻譯《論語》、《詩經》中片段以及文選中的文章。此外，他們還要分析一些佛經中的章節，比如《般若波羅蜜經》等。

瓦西裏耶夫在講授漢滿語言及文學的同時，非常重視中國歷史的教學。早在喀山大學期間他就已經開始講授中國歷史課程，到達聖彼得堡之後，他對講義又進行了更新和充實。這門課程的主要內容包括中國早期歷史（西元前7世紀之前）以及從西周到清朝的重大歷史事件，同時還向學生介紹一些少數民族的歷史，如匈奴、鮮卑、契丹、女真和蒙古人的歷史，著重講授滿人的歷史，同時分析古代居住在滿洲地區的唐古特人的歷史，研究宋、元、明三朝的女真、契丹和滿人，介紹滿清政權的建立過程及其所進行的戰爭。瓦西裏耶夫在激發學生歷史興趣的同時，努力造就他們通過分析文本（如司馬遷、朱熹、魏源等人著作）來思考歷史典籍的方法。一名叫吉賓（Л.Зыбин）的學生在瓦西裏耶夫的建議下於1889年將部分《資治通鑑綱目》翻譯成俄文。在瓦西裏耶夫的堅持下，中國歷史問題成爲學生論文競賽的題目。瓦西裏耶夫在歷史教學和研究中也充分考慮了中國及其臨近地區的地理。他在歷史和地理教學中始終使用自己在北京時期編寫的12張中國各朝代歷史地圖，其中一幅一直懸掛在他講課的教室中。

瓦西裏耶夫爲所有年級開設「中國文化史」課。從1863-1865年間的一份教學大綱中我們可以看到他當時的授課內容：孔子以前的中國古代教育；儒學的意義；孔子的生平以及漢代初期以前的傳播史。在1870-1871

年度的大綱中列出了他「佛教歷史及文獻」課程的內容：對印度佛教狀況的普遍看法；佛教教義：道德、思辯、頓悟；宇宙觀；印度佛教與藏傳佛教、印度佛教與中國佛教經籍之區分；古代佛教書籍——大乘和小乘佛教文獻；中國佛教歷史；該信仰在中國早期傳播的可信程度；佛教在中國的傳播路線；政府對這種信仰的態度、庇護及排斥；中國佛教的特點；在中國形成的各種流派；中國佛教僧階著名人物；佛經漢譯過程；中國赴印旅行家的科學意義。這些教學計畫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瓦西裏耶夫對佛教的研究水平以及聖彼得堡大學的中國文化教學情況。

爲提高教學質量，東方語言系還吸收優秀的口語教師來校工作，其中既有中國人，也有具備高水準口語實踐能力的俄國人，比如斯卡奇科夫、佩休羅夫、紮哈羅夫等人。此外，他積極爲那些沒有經過實踐鍛煉的漢滿蒙語教師爭取出國學習和考察的機會。

在聖彼得堡大學期間，瓦西裏耶夫編寫了許多教學急需的教科書。1863年，他編寫的《滿語文選》（Маньчжурская хрестоматия для первоначального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出版，這是俄國第一部正式出版的滿語教科書。1866年，瓦西裏耶夫石印出版了《滿俄詞典》（Маньчжурско-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同年，《中國象形文字分析》（Анализ китайских иероглифов）問世。第二年《漢字字形系統·第一部漢俄詞典試編》（Графическая система китайских иероглифов. Опыт первого китайско-русского словаря）出版，作者首次在世界上使用他所發明的漢字字型系統。他的漢語詞典編纂思想後來獲得了廣泛的認可。1868年，瓦西裏耶夫出版了三卷本的《漢語文選》（Китайская хрестоматия），此書成爲以後幾代漢學家的漢語學習課本。此外，瓦西裏耶夫撰寫一系列學術著作，將俄國漢學研究提升到世界先進水平。關於中國史地的著譯主要有《甯古塔紀略》（Записки о Нингуте）（1857年）、《滿洲志》（Описание Маньчжурии）（1857年，譯自《盛京通志》）、《元明兩朝關於滿族人的資料》（Сведения о маньчжурах во времена династий Юань и Мин）（1863年，博士論文）、《大清初期對蒙古人的安撫》（Приведение в покорность монголов при начале Дайцинской династии）（1868年，譯自《聖武記》）、《軍機大臣馬思哈出巡北部邊疆日記》（Дорожник член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совета Масыха в походе на север до границы）（1881年）等。佛教方面的著譯主要有《佛



教及其教義、歷史和文獻》(Буддизм, его догматы, история и литература) (1857年出版第一卷、1869年出版第三卷)、《佛教術語詞典》(Буддийский терминолог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手稿)、《佛教文獻述評》(Обзорение будди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手稿)等。在語言文字方面還有世界上最早的一部中國文學史專著《中國文學史概論》(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880年)。

1887年，俄國科學界舉行各種活動，紀念瓦西裏耶夫執教50周年。他先是被喀山大學選為榮譽成員，而後在9月6日又被聖彼得堡大學選為榮譽成員。在大學委員會給他的賀詞中寫到：「您的中國歷史研究，通古今之變，不僅內容充實，而且別具匠心。您的觀點出自您對中國人民及其生活原則特點的瞭解……事實上，在您每一部有關東方的著作中，我們所能得到的只有教誨，同時為您那活躍的思維、獨到的思想以及將我們所陌生的東方奧秘變成了清晰而鮮活的形象而驚訝不已。您是我們的光榮，我們的驕傲……。」⁵ 1893年，瓦西裏耶夫退休。聖彼得堡大學請求瓦西裏耶夫為所有年級學生開設「中國的政治、歷史及文學」課，每周兩小時。1900年4月27日，瓦西裏耶夫病逝，身後留下大量沒有發表的手稿。他的同事及學生無不感到痛心和惋惜，紛紛發表文章，悼念這位俄國漢學巨匠。著名東方學家鄂登堡(С.Ф.Ольденбург, 1863-1934)寫到：「這是這位大學者的悲劇，他應該知道，在他的書架上放著不為人所知的著作，那是他長年的工作成果，可後來在西方一部接一部地問世了他早已從事過的研究著作。」同時，鄂登堡對瓦西裏耶夫所開創事業的未來充滿信心：「在瓦西裏-巴甫洛維奇深愛的聖彼得堡大學東方語言系有一股年輕的力量，他們繼續著瓦西裏耶夫的事業，獻身遠東研究。」⁶

四、東方語言系的其他漢學教師

從1855年漢語教研室和滿語教研室成立(1863年合併為一個漢滿語教研室)到1917年十月革命，除了

大漢學家瓦西裏耶夫以外，還有許多教師在這裏任教，其中大部分都是瓦西裏耶夫的學生，也有從駐北京傳教士團或外交使團歸來的學者。他們雖然任教時間不同，所教課程各異，但都為俄國的漢滿蒙語教學做出了應有的貢獻。他們是：阿布-卡裏莫夫(И.Абу-Каримов, 1800-1865)、斯卡奇科夫(К.А.Скачков, 1821-1883)、佩休羅夫(Д.А.Пешуров, 1833或1837-1913)、紮哈羅夫(И.И.Захаров, 1814-1885)、伊萬諾夫斯基(А.О.Ивановский, 1863-1903)、格奧爾吉耶夫斯基(1851-1893)、波茲涅耶夫(С.М.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1851-1920)、波波夫(А.М. Позднеев, 1842-1913)、伊萬諾夫(П.С.Попов, 1878-1925後)、阿列克謝耶夫、柳比莫夫(А.Е. Любимов, 1878-?)、斯梅卡洛夫(Г.Ф.Смыкалов, 1877-1955)等。此外，還有數名中國教師先後在這裏執教，如貴榮(Гуй Жун)、蘇鍾(Су Чжун, 1831-?)、高英齊(Гао Иньци, ?-1892)、邵恒巽(Шоа Хэнсюнь)、蒯法(Куэ Фан)、孟僖紹(Мэн Сишоу)、陳先生(Чэн)、錢施恩(Цюань Шиэн)和張英(Чжан Ин)等。⁷

阿布-卡裏莫夫：自1855年到1865年期間在聖彼得堡大學東方語言系任教，是瓦西裏耶夫的助手，負責書法和漢語實踐課的教學工作。

1863年，斯卡奇科夫從駐中國塔城總領事任上回到聖彼得堡。1865年2月，他應邀到科學院亞洲博物館編寫漢文書目，整理1864年從外交部亞洲司轉來的中國藏品。由於阿布-卡裏莫夫去世，瓦西裏耶夫力邀他到聖彼得堡大學任教，整理書目的工作因此中斷。他於1866年1月8日開始教學工作。他擬定的教學計畫包括漢語口語會話、俄譯漢、翻譯中國白話小說《紅樓夢》、《金瓶梅》等。遺憾的是，斯卡奇科夫的教學工作只持續了很短的時間。由於他熟知中俄貿易情況，1867年被俄國政府派往中國天津擔任領事一職。

佩休羅夫是聖彼得堡大學物理數學系的畢業生，1857年作為學員參加了俄國東正教駐北京傳教士團，管理天文臺。在北京時曾撰寫〈中國明朝的地震〉(Землетрясения, бывшие в Китае во время Минской династии)

5 轉引自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с середины 19 века до 1917 года. М.: Изд. фирма "Вост. лит." РАН, 1997. 頁 271。

6 轉引自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с середины 19 века до 1917 года. М.: Изд. фирма "Вост. лит." РАН, 1997. 頁 274。

7 曾在聖彼得堡大學東方語言系任教的中國教師數量可能更多，因教學時間大都很短，檔案中少有記載，難考其真實姓名，文中姓名均為俄文音譯。



一文，刊登在 1860 年《俄國皇家地理學會普通地理學論叢》（*Записки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по общей географии*）。1863 年，佩休羅夫進入外交部亞洲司工作。斯卡奇科夫離開聖彼得堡大學後，東方語言系漢滿語專業又只剩下瓦西裏耶夫一人。但過了不久，在俄國駐中國大使館做譯員的佩休羅夫就從中國回來了。1869 年，他接受了東方語言系的邀請，於 1870 年來漢滿語教研室教授漢語。佩休羅夫的漢語口語極好，所以起初承擔了學生口語實踐課的教學工作。例如在 1870-1871 學年度他給一、二年級學生上的課程包括口語訓練、翻譯白話或接近白話風格的書籍，使用《清文啟蒙》、《好速傳》等作為教材，同時向學生傳授語法方面的知識。而在三、四年級，除了繼續練習口語以外，開始鍛煉學生互譯包括公文在內的各種題材和風格的文章。此外，佩休羅夫也給學生講授中國歷史和地理知識，介紹中國的國家體制，而所使用的教材則是《京報》和威妥瑪（*Wade*, 1818-1895）的《語言自邇集》（*A progressive course designed to assist the student of colloquial Chinese*）。他於 1890 年升為編外教授，1905 年退休。阿列克謝耶夫是佩休羅夫的學生，他在日記中曾這樣評價自己的老師：「佩休羅夫是位耐心而寬厚的教師。這位漢學家的經歷很有意思：他是一個天文學碩士，寫過科學著作，到中國後曾負責天文臺工作，同時迷上了漢學。由於他具有非凡的記憶力和工作能力，因而在這一領域取得了成就。他能將文章倒背如流，令我們學生大為驚訝。上漢語課時只講語言（包括規則、經驗和逐字翻譯），不談文化，現在我以為那是絕對錯誤的。」⁸ 佩休羅夫在聖彼得堡大學工作期間的主要著作有：《漢俄詞典》（聖彼得堡，1887，1888，1891 年），是俄國第一部袖珍漢俄詞典，1891 年再版時編排方式由依照部首改為依照字形；《俄中條約彙編（1689-1881）》（聖彼得堡，1889 年），為俄漢滿法文對照，至今仍是唯一一部同時具有這四種語言文本的條約集；《漢文文選資料》（教材）（聖彼得堡，1897 年）；《聖彼得堡大學東方語言系大學生漢語讀本》（聖彼得堡，1907 年，石印）等。

紮哈羅夫早年畢業於沃龍涅什傳教士學校和聖彼得

堡神學院，1839 年自願作為俄國東正教駐北京傳教士團學員來華。在北京期間，他將精力主要放在滿語學習上，並開始編寫後來給他帶來世界聲譽的滿俄詞典。紮哈羅夫 1849 年回國，在俄國外交部任職。1851 年至 1864 年先後任俄國駐新疆伊犁的領事和總領事。在中俄西部邊界談判中幫助俄國攫取我西部大片領土。1866 年被亞洲司辭退。1868 年，紮哈羅夫開始在聖彼得堡大學教授滿語，所使用教材為瓦西裏耶夫先前編寫的《滿語文選》和《滿俄詞典》（*Маньчжурско-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他為一年級學生講授滿語語法時還使用《清文啟蒙》和自己在北京時所做的筆記。二年級時則從瓦西裏耶夫編寫的《滿語文選》中選擇稍難一些的文章鍛鍊學生俄滿翻譯能力。到了三年級和四年級，紮哈羅夫就從滿文的《西廂記》、《大清律例》和《通鑑綱目》中選一些文章片段進行翻譯練習，同時鍛鍊學生翻譯俄文外交文書。1875 年，他所編寫的《滿俄大詞典》（*Полный маньчжурско-русский*）出版，獲俄國地理學會金質獎，聖彼得堡大學授予其滿文博士學位。1876 年在聖彼得堡召開的第三屆國際東方學家代表大會上任遠東組副主席。1879 年紮哈羅夫於聖彼得堡出版了《滿語語法》（*Грамматика маньчжурского языка*）一書，同年獲得教授職稱。直到 1885 年去世，他沒有離開過聖彼得堡大學東方語言系漢滿語教研室。

伊萬諾夫斯基 1885 年畢業於聖彼得堡大學東方語言系，並獲得副博士學位。同年，教授滿語達 17 年之久的紮哈羅夫患病突然去世，使滿語教學一度陷入困境。為了保持教學的連續性，瓦西裏耶夫當即決定留伊萬諾夫斯基任教，以補紮哈羅夫之缺。瓦西裏耶夫非常器重伊萬諾夫斯基的才華，立即提升他為東方語言系滿語副教授。1887 年伊萬諾夫斯基獲得碩士學位。但是，伊萬諾夫斯基的快速提升遭到了東方語言系同僚的反對，他們指責瓦西裏耶夫過分偏愛這個年輕人。1890 年伊萬諾夫斯基前往中國考察，於途中記了 10 大本日記，其中包括索倫族和達斡爾族的語言材料。回國後擔任聖彼得堡大學教授，講授漢語、滿語和滿洲歷史等課程。1900 年患重病，3 年後死於精神病院。他的學生阿列克謝耶夫院士回憶到：「我們的另外一位教授

8 引自阿列克謝耶夫著、閻國棟譯，《1907 年中國紀行》，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1 年 9 月版，頁 272。



伊萬諾夫斯基沈迷於對中國的認識，他不是通過口授來達到我們對文章的理解，而是借助於書籍。講課時穿插一些笑話和箴言，課堂氣氛活躍。作為一名教授，他在所有方面都效仿他所熱愛的老師——俄國最偉大的漢學家瓦西裏耶夫。他也同瓦西裏耶夫一樣懂許多種語言：滿語、蒙古語、藏語和梵文，當然遠遠沒有達到瓦西裏耶夫的水平。伊萬諾夫斯基的命運是淒慘的。他實際上因為不堪中國文學這門龐大課程的重負而倒下，病得很重，還酗酒。他窮困潦倒，經常抱怨無錢購買所需書籍。在我們俄羅斯，類似的勤奮學者的遭遇不足為奇。」⁹ 伊萬諾夫斯基在聖彼得堡大學期間的著述主要有：《滿洲史概要》（Конспект истории Маньчжунии）（聖彼得堡，1887年）；《中國西南部的異族歷史資料——元、明、清各朝的雲南異族人（附辭彙和石印地圖兩幅）》（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истории инородцев Юго-Западного Китая... Юнь-наньские инородцы в период династий Юань, Мин и Дай-цин. С приложением словаря и двух литографированных карт）（碩士論文，1888年）；〈佛祖生活實錄〉（Иллюстрации из жизни Будды）（載《東方評論》〈Восточ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1890年第1期）；〈論佛經的漢譯問題〉（Окитайском переводе буддийского сборника）（載《俄國皇家考古學會東方部論叢》〈Записки Восточного отделен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1891年第11期）；〈滿洲的銅幣〉（Медная монета Маньчжурии）（載《俄國皇家考古學會東方部論叢》1892年第7卷）；〈北滿的中國民歌〉（Китайские песни Северной Маньчжурии）（載《俄國皇家考古學會東方部論叢》1893年第8卷）；〈滿語文選〉（Маньчжурская хрестоматия）（聖彼得堡，1893年第1輯，1895年第2輯）；〈滿洲學1：索倫語和達斡爾語範例〉（Mandjurica 1. Образцы солонского и дахурского языков）（聖彼得堡，1894年）；〈滿語轉寫的西藏經文〉（Тибетский текст в маньчжурской транскрипции）（載《東方筭記》〈Восточные заметки〉，聖彼得堡，1895年）。

格奧爾吉耶夫斯基1873年畢業於莫斯科大學語文系，1875年入聖彼得堡大學東方語言系，從瓦西裏耶夫為師。1880年從漢語班畢業，獲得副博士學位，隨

即前往中國，在茶葉貿易公司服務兩年後回到東方語言系繼續深造。1885年獲得碩士學位。同年開始在東方語言系授課，講授漢語和中國歷史。1889年通過博士論文答辯，獲得教授職稱。他為一年級學生講授漢語及文字的基本特點，介紹中國的政治體制。為二年級講授《四書》的閱讀和翻譯，分析早期儒學的本質。三年級繼續教授儒學，主要介紹新儒學的特點。四年級鍛鍊學生翻譯古文的能力，同時介紹司馬遷和王安石的生平及活動。此外，格奧爾吉耶夫斯基還為二年級和四年級學生開設了「中國歷史事件」課。瓦西裏耶夫的佛學課和格奧爾吉耶夫斯基的有關中國儒學、文學的課程比較系統地向學生傳授中國的哲學思想。1893年，格奧爾吉耶夫斯基在法國的梅茨出差時，因患肺病去世。伊萬諾夫斯基接替了他的漢語課程，但中國歷史課卻一直到1897年才由編外副教授波茲涅耶夫恢復。格奧爾吉耶夫斯基在聖彼得堡大學期間的主要著述有：《中國初史（迄於秦始皇）》（Первый период кита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До императора Цин-ши Хуанди）（碩士論文，聖彼得堡，1885年）；《對反映古代中國人民生活史的象形文字分析》（Анализ иероглифиче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как отражающей в себе историю жизни древне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博士論文，聖彼得堡，1882年）；《中國的生活原則》（Принципы жизни Китая）（聖彼得堡，1888年）；《漢語的根本結構和中國人的起源問題》（О корневом составе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связи с вопросом о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и китайцев）（聖彼得堡，1888年）；《研究中國的重要性》（Важность изучения Китая）（聖彼得堡，1890年）；《中國人的神話觀和神話》（Мифические воззрения и мифы китайцев）（聖彼得堡，1892年）。

波茲涅耶夫1876年畢業於聖彼得堡大學東方語言系，是瓦西裏耶夫的親傳弟子。1881年獲得碩士學位，1883年獲博士學位，1884年為聖彼得堡大學蒙古-卡爾梅克語教研室教授。1897年接替4年前去世的格奧爾吉耶夫斯基，為漢滿語學生開設中國歷史課。1898年起在漢滿語教研室工作。但是，他的中國歷史教學只持續了約兩年時間，便被國民教育部調往海參崴，擔任新組建的東方學院的第一任院長。其大部分著

9 引自阿列克謝耶夫著、閻國棟譯，《1907年中國紀行》，頁273。



作均以蒙古歷史研究為題。

波波夫又稱柏百福，筆名為茂陵，1865年入聖彼得堡大學神學院，1866年轉入東方語言系漢滿班，從瓦西裏耶夫為師。1870年畢業，獲得副博士學位，同年被外交部派往駐北京使館擔任譯員。1886年起擔任俄國駐北京總領事，1890年獲科學院通訊院士稱號。1900年是俄國漢學史上令人沈痛的一年，瓦西裏耶夫這顆俄國漢學的巨星不幸隕落，與此同時，伊萬諾夫斯基也患了重病。由於波茲涅耶夫早在1899年就已調往東方學院，新留校任教的施密特（П. П. Шмид, 1869-1938）和魯達科夫（А. В. Рудаков, 1871-1949）也被派到海參崴工作，漢滿語專業只剩了佩休羅夫和中國教師蒯法。佩休羅夫儘管年事已高且疾病纏身，仍然忘我工作，為所有4個年級上課。東方語言系領導意識到了佩休羅夫一旦倒下將給漢滿語專業帶來的影響，積極物色後備人才。1902年，波波夫回到俄國，在聖彼得堡大學的力邀下進入東方語言系漢滿語教研室任編外副教授。9月20日，波波夫發表了他的開學演講。他在講話中指出中國是最古老的文明搖籃之一，同時分析了中俄關係的各發展階段。他主講的課程是漢語，為一、二年級上課時使用的主要教材是威妥瑪的《語言自邇集》，同時講授漢語導論和漢字結構分析。為三年級學生講解《孟子》和秦漢時期的歷史。四年級的學生除了要閱讀歷史文獻、《紅樓夢》和《京報》以外，還須學習《論語》和1881年《中俄伊犁條約》的文本。波波夫對俄國漢學做出的最大貢獻在於增補並出版了卡法羅夫生前未能來得及完成的《漢俄合璧韻編》（*Китайско-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到1913年去世，波波夫再沒有離開聖彼得堡大學。波波夫在聖彼得堡大學教學期間的主要著作有：《漢語口語課本》（*Китайские тексты разговорного языка*）（聖彼得堡，1903年）；《中國的國家制度和行政機構》（*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строй Китая и органы управления*）（聖彼得堡，1903年。續編出版於1909年）；《中國哲學家孟子》（*Китайский философ Мэнцзы*）（聖彼得堡，1904年）；《漢語文選》（*Избранные китайские тексты*）（聖彼得堡，1905年）；《漢語研究簡編導論》（*Краткое введение к изучению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日本橫濱，1908年）；《中國的憲法和地方自治機關》（*Конституция и земские учреждения в Китае*）（聖彼得堡，1910年）；《孔夫子及其弟子等人的格言》（*Изречения Конфуция, учеников его и других лиц*）

（聖彼得堡，1910年）；《從古代至西元十世紀下半期中國刑法簡史》（*Кратки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уголовного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а Китая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X века по Р. Х.*）（載《第三屆東方學家大會文集》〈*Труды III съезда ориенталистов*〉）等。

伊萬諾夫1901年畢業於聖彼得堡大學東方語言系，留校準備晉升教授職稱。1904年曾來中國考察，豐富了漢語知識。起初伊萬諾夫將主要精力用於王安石活動研究，而後開始研究中國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他反對西方一些歷史學家有關中國只有政治史，而無社會史的觀點。1913年以《中國哲學資料：導言、法家、韓非子》（*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китай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Введение. Школа Фа. Хань Фэй-цзы*）為題通過博士論文答辯，同年晉升為漢滿語教研室編外教授。他在20世紀的前10年中發表了大量著作，其中大部分以研究中國邊疆民族地區為題。他對科茲洛夫（П. К. Козлов, 1863-1935）從中國西夏古城哈拉浩特掠回俄國的西夏文獻的研究頗有價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被任命為外交部譯員。

阿列克謝耶夫1902年從聖彼得堡大學東方語言系畢業，後到西方國家及中國進修。1916年以《司空圖的〈詩品〉（翻譯與研究）》（*Китайская поэма о поэте. Стансы Сыкун Ту (837-908)*）為題通過碩士論文答辯。阿列克謝耶夫是20世紀上半期俄國最偉大的漢學家，是十月革命以後蘇聯承前啓後、繼往開來的一代漢學家的代表。他不僅在漢學的諸多領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而且還根據時代的要求和世界漢學發展大勢為蘇聯漢學的發展確定了新的任務，在漢學的概念、範疇、物件以及研究方法上提出了精闢的見解。阿列克謝耶夫是世界公認的蘇聯新漢學的奠基人，他以淵博的學識和獨特的治學方法得到其眾多弟子和後代漢學家的景仰，人稱「阿翰林」。他一共發表了260多種漢學著作，最著名的有《司空圖的〈詩品〉（翻譯與研究）》（彼得格勒，1916年）、《中國文學選集》（莫斯科，1978）、《東方之科學》（莫斯科，1982年）、譯作《聊齋志異》（聖彼得堡，2000年）等。

1917年之前曾在聖彼得堡大學工作過的還有柳比莫夫和斯梅卡洛夫。柳比莫夫從聖彼得堡大學東方語言系畢業後留校從事教學工作，1908年曾來過中國，將許多漢滿語書籍帶回俄國。1917年以後放棄漢學。斯梅卡洛夫自1911年起在實用東方研究院教授漢語。



聖彼得堡大學東方語言系漢滿語專業從一開始就開設口語課程。這些口語教師中不僅有俄國漢學家，同時也有許多中國人。第一個教授漢語口語的教師是阿卜卡裏莫夫，他在喀山大學（1853-1855）和聖彼得堡大學（1856-1865）前後工作了12年。1865年阿卜卡裏莫夫去世後由斯卡奇科夫接替，但時間不長（1865-1867），而後是佩休羅夫。從1884年開始，漢語口語課由中國人擔任。第一位是貴榮，他是中國使團的官員，曾在北京隨波波夫學習過俄語，1884-1885年間在這裏工作。接替貴榮的是蘇鍾，他是19世紀下半葉新疆地區回民起義失敗後逃到俄國的，1885-1887年間在東方語言系任教，後往中亞謀生。蘇鍾之後約4年的時間沒有中國教師教課。直到1891年才有高英齊來校。他原來是中國伊犁翻譯學校的教師，在這裏講授口語和書法，但很快就在1892年患霍亂病逝。1897年，中國大使館的邵恒巽受邀在這裏教了半年，而後由蒯法接替。蒯法也是中國大使館成員，在這裏共教了6年（1898-1904）。然後是孟僖紹，但不明其來歷。1907-1909年間口語課由陳先生擔任，他是華俄道勝銀行的職員。1912-1913年在這裏執教的是錢施恩，1914-1915年為張英。中國教師主要負責口語教學，在學術上沒有留下什麼著述。由於許多教師的教學時間非常短暫，以致於在俄國的檔案中也沒有保留下來有關他們的資料，就連他們的真實名字考究起來也非常困難。但是，早在19世紀的俄國就有如此之多的中國人在高等學府教授漢學知識，這在全世界都是很罕見的。

五、聖彼得堡大學在俄國漢學史上的地位

聖彼得堡大學在俄國漢學史上佔據重要地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19世紀下半期的俄國漢學。俄國學術界充分肯定了聖彼得堡大學東方語言系在教學、教材以及學術研究上的成就。這裏不僅曾是俄國最主要的漢學基地，而且彙集了俄國所有最優秀的漢學家，可謂人才濟濟。大漢學家瓦西裏耶夫在這裏辛勤耕耘40餘載，結束了俄國漢學家以俄國東正教駐北京傳教士為主體的時代，推動俄國漢學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代——大學時代。他培養了許多著名的漢學家、滿學家、蒙古學家、藏學家，甚至於日本學家、朝鮮學家和東南亞研究

專才。他所締造的俄國第一個漢學學派以其獨特的研究物件、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不僅為俄國學術界所承認，而且得到國際漢學界的矚目。

與西方漢學相比，這個漢學學派在各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某種程度上，他們的漢學研究與西方漢學形成了相互補充的格局。譬如在中國史地研究方面，受其國家在華利益以及民眾興趣影響，西方更重視中國的沿海及內地，而俄國卻將研究的重點放在中國邊疆地區。在研究方法上，瓦西裏耶夫漢學學派注重獨立研究，就漢滿蒙藏文原文進行翻譯，並在此基礎上進行昇華，很少吸收借鑒外國漢學研究成果。儘管這種方法不利於國際間的學術交流，但卻有助於俄國學者形成獨具特色的思想。聖彼得堡大學漢學學派的另外一個特點是漢學、滿學、蒙古學、藏學同時並舉，一同發展。有的漢學家同時也是滿學家和蒙古學家或藏學家。這種知識結構便於他們閱讀不同文字的文獻資料，從而有利於更加全面地認識中國文化，撰寫出高水準的著作，培養複合型人才。此外，聖彼得堡大學東方語言系也是其他東方語言教學機構師資的培養基地。1899年建立的遠東漢學基地海參崴東方學院的教師便全部來自聖彼得堡，有學者甚至稱以魯達科夫、施米特為代表的遠東漢學家為「聖彼得堡學派分支」。因此可以說，聖彼得堡大學不僅代表了19世紀下半期的俄國漢學，同時也為20世紀俄國漢學的進一步發展積累了經驗並準備了人才。如果沒有瓦西裏耶夫學派的鋪墊，也就不可能產生以阿列克謝耶夫院士為代表的「阿列克謝耶夫學派」。阿列克謝耶夫繼承了聖彼得堡大學優良的漢學傳統，學習了西方先進的研究方法和理論，開創了蘇聯漢學研究的新局面。

但是，聖彼得堡大學的漢學研究也有諸多不足。學校的教學內容幾十年來少有變化，教學方法死板，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學習效果。阿列克謝耶夫的女兒班科夫斯卡婭（М.В. Баньковская）在為其父著作《1907年中國紀行》中文本所作的序言中寫到：「他於1898年考入的聖彼得堡大學令他大失所望。19世紀俄國漢學巨匠瓦西裏耶夫已處於其生命和活動的後期。他所創立的學派為科學研究中國奠定了基礎，儘管取得了毋庸置疑的成就，但也存在有目共睹的不足。……教學方式也與中學一樣：『……在完全不懂文本意思的情況下死記硬背，語法沒有規則和明確的思想，毫無



意義的翻譯令人驚訝……絲毫沒有大學的味道，也沒有上過任何導論課程。」¹⁰ 學術上過度封閉，與國際漢學界缺乏交流，不利於在學術上開闊視野、兼收並蓄。另外，聖彼得堡大學儘管師資雄厚，但培養的漢學人才並不太多。從 1855 年到 1919 年的 60 餘年當中，東方語言系所培養的漢學人才不足百名，有的年份招生人數只有寥寥數人。這一方面決定於中俄關係發展水平，

同時也與此專業過於難學有一定關係。到了 19 世紀末期，由於俄國在中國東北修建中東鐵路，翻譯人才需求倍增，東方語言系漢滿語專業一度炙手可熱。但是這裏的人才培養方式已經不能適應時代對東方語言實踐型人才的需求，以培養實踐型人才為宗旨的海參崴的東方學院便隨之應運而生。

10 引自阿列克謝耶夫著、閻國棟譯，《1907 年中國紀行》，頁 3。

漢學研究中心出版新書消息

經學研究論著目錄（1993-1997）

漢學研究中心叢刊 目錄類第 9-3 種

林慶彰、陳恆嵩主編

漢學研究中心編印

定價：新臺幣 1,200 元（國內）、美金 60 元（國外），含郵資

洽詢電話：（02）23619132 轉 315

郵政劃撥 07130991 號 「漢學研究中心」帳戶